

改革開放前夕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組建、派出及影響*

付庚金 夏泉

[摘要] 改革開放前夕，中共中央派出以段雲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赴港澳考察，旨在重振對港澳市場的影響力、擴大對外貿易，並學習借鑑港澳經濟騰飛的經驗。考察組的成員經過精心遴選，考察方案規劃周全，在廣泛聽取意見和認真總結經驗後，最終順利完成了考察任務，所形成的具可行性的專題報告也在後續工作中得以落實。此次考察還掀起了各部委和各行各業赴港澳考察的熱潮，加強了與粵港澳的經濟聯繫，為促進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關鍵詞] 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 《港澳經濟考察報告》 改革開放 段雲

改革開放前夕，中共中央把派出境外考察組作為引進先進技術、學習先進經驗的重要途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察組有四個：以林乎加為組長的赴日經濟代表團；以段雲為組長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以李一岷為組長的赴南斯拉夫代表團；由谷牧率領的赴西歐五國經濟代表團。目前，學界關於上述考察團體的研究已取得一定學術成果，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三方面：一是考察的歷史背景，相關學者多從國際地緣政治和國內經濟建設需求的角度分析；^①二是考察的內容，部分研究梳理了代表團對國（境）外經濟、工業和農業等領域的考察情況，主要側重於對西歐和日本的考察；^②三是考察的影響，研究認為這些考察開闊了視野，加強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聯繫，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借鑑。^③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多聚焦宏觀背景和整體影響，對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具體內容及其特殊作用的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新中國成立以來粵港澳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批准號：22VMZ00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付庚金，暨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夏泉（通訊作者），暨南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主任，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

^① 蕭冬連：《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蕭冬連：《篤路維艱：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蕭冬連：〈關於改革開放起步時期國際環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4期，2022年，頁85—96；蕭冬連：〈中國改革開放的緣起〉，《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12期，2017年，頁26—41；蕭冬連：〈國門是如何打開的——中國對外開放的起步過程〉，《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4期，2018年，頁25—41。

^②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李海文：〈我們所走過的引進道路〉，《經濟導刊》（北京），第11期，2018年，頁82—96；谷牧：〈我國對外開放國策的醞釀和起步〉，《黨的文獻》（北京），第1期，2009年，頁21—27；文世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對外經濟考察活動〉，《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4期，2017年，頁88—101。

^③ 黃一兵：〈試析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黨的文獻》（北京），第2期，2007年，頁70—74；蕭冬連：〈中國改革初期對國外經驗的系統考察和借鑑〉，《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4期，2006年，頁22—32；劉強：〈論“洋躍進”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關聯〉，《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武漢），第6期，2009年，頁16—22；樊超、王珂：〈考察出訪與中國對外開放的起步（1978—1979）〉，《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北京），第3期，2021年，頁37—46。

研究仍顯不足。有鑑於此，本文擬根據相關文獻資料，探討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組建背景、考察內容，及其對港澳與祖國內地經濟交往發展的推動作用。

一、因應時變：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組建背景

改革開放前夕，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為中央治國理政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一方面，粉碎“四人幫”後，經濟建設與民生改善成為黨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工農業發展的遲緩，導致市場物資匱乏，人民生活困難。毗鄰港澳的廣東與港澳發展的巨大差距，讓當地的民生問題更加凸顯。臨近香港的地區出現多次大規模“逃港潮”，不僅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直接影響農業生產。^①另一方面，中西方關係緩和為對外考察、引資引技提供可能。尼克森總統訪華後，中美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中國和西方的關係得到改善。中英、中葡關係則一直比較微妙，葡萄牙呈現更加“親中”的姿態，中英之間維持着一種既鬥爭又合作的關係。此外，內地作為港澳地區最主要的物資供應地，因國內局勢影響，供應物資貨源緊張，出口量出現波動，加之當時內地商品存在品質、樣式缺陷，難以同美日等國商品競爭，^②逐漸失去了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

有見及此，中央開始組織對外考察工作。1977年7月，國家計委在《關於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規劃的請示報告》中，首次提出“認真組織好出國考察工作”。^③1977年9月，為落實寶鋼技術引進問題，冶金部派副部長葉志強率團赴日考察，發現中國冶金技術水平比日本落後至少20年。^④這一考察結果引起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到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學習外國經驗的緊迫性。^⑤1978年3月，李一氓受中共中央委派率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對外考察工作進入中央層面。同時，奪回港澳市場的工作也在醞釀中。毗鄰香港的寶安打算利用地理位置的優越性、華僑港澳同胞眾多的優勢、便利的進出口條件和以往成功的邊境經濟政策等等，改革不適應邊境經濟發展的管理體制，以改善民眾生活及解決“外逃”問題。^⑥1978年3月，國家計委、外貿部、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進出口總公司組成聯合工作組到廣東寶安、珠海兩地實地調研建設生產基地問題，並制定進出口規劃，研究政策措施。^⑦1978年4月10日，肩負着考察港澳市場、學習港澳先進經驗重任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正式展開考察工作。該考察體現了中央三方面的戰略考量：

^① 葉劍英：〈利用一切有利條件，加快廣東建設步伐〉，《葉劍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06-07。

^② 〈1974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港澳與外國商人對我部分出口商品包裝潢的反映〉，1974年8月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4-2-128-043-060，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③ 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一分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頁33。

^④ 李海文：〈華國鋒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發軔〉，《黨史博覽》（鄭州），第8期，2018年，頁5。

^⑤ 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一分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頁90。

^⑥ 方苞：〈深圳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的實踐和認識〉，深圳市檔案館編：《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4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頁3100。

^⑦ 陶一桃主編：《深圳經濟特區年譜：1978.3-2015.3》（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年，頁1。

一是深入探究港澳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學習發展經驗。20世紀60、70年代，恰逢世界第二次產業轉移。香港和澳門憑藉廉價的土地、勞動力和優越的地理位置，承接從美、日等國遷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經濟騰飛。1960年全港有工廠5,000家左右，工人21萬左右，僅紡紗廠就超過30家，僱用16,000餘人。^①1970年代，香港成衣、玩具、塑膠錶和鐘錶等產品的出口金額或出口數量已名列世界首位，成為亞洲地區輕工業品製造中心之一。^②1960年代以來，澳門旅遊業開始興起，1961年訪澳遊客達到51萬人次，1979年突破300萬人次。^③香港和澳門既沒有耕地，又無原材料，但是香港卻成為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澳門成為旅遊中心。通過考察港澳經濟貿易，領導幹部可切實瞭解港澳經濟發展情況，總結成功經驗，進而推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二是盡快鞏固內地產品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保持內地商品在港澳市場的絕對優勢，既有經濟原因，又有政治考量。一方面內地作為港澳最重要的物資供應地，為兩地市民日常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內地供應的鮮活物資“品質好，品種多，價格合理，經濟實惠”，適合廣大居民的需要和購買力，因此廣受歡迎。^④如果內地供應減少，會導致物價上漲，生活成本增加，不利於穩定民心。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前的對港澳供應工作有階級立場和民族情感的政治意義。^⑤周恩來多次指示要把對港澳供應當作“政治任務”。^⑥1972年3月，李先念在外貿會議上指出：“香港人是中國人，吃美國貨他們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有愛國的心情。”^⑦做好港澳供應工作，可以爭取民心民意，厚植港澳同胞的愛國情懷，增強對內地的認同感。通過港澳考察，進一步瞭解港澳的市場情況，有利於中央調整供應策略，改革供應制度，建設好寶安和珠海外貿基地，進而打贏港澳市場爭奪戰。

三是發揮港澳地緣優勢做好外貿工作。當時受國內形勢影響，國內對外出口的份額和品質出現下降。1972年4月，周恩來在接見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和參加廣交會有關部門和代表時強調：“現在我們出口數量不大，品質這麼差，怎麼向國家交待？怎麼向人民交待？”^⑧為了擴大外貿出口，中央和地方意識到港澳的重要性。1973年12月，陳雲在聽取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匯報時指出：要充分利用德信行和香港。^⑨1974年7月，陳雲提出：要把華潤公司變成“外貿第二部”。^⑩1975年，廣東省向外貿部請示利用港澳

^①鄭德良編著：《現代香港經濟》，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頁130。

^②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頁307。

^③陳麗君：《澳門經濟》，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頁85。

^④〈祖國源頭供澳主副食品 成為安定澳門廣大居民生活重要因素〉，《澳門日報》（澳門），1976年7月17日，版4。

^⑤歐陽湘、唐富滿：〈從內地對港澳地區的出口供應看中國共產黨的港澳工作方針（1949–1978）〉，《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10期，2012年，頁39。

^⑥徐日彪：〈為順利解決香港問題奠定扎實基礎——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與香港回歸〉，《人民日報》（北京），1997年6月24日，版9。

^⑦《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294。

^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頁518。

^⑨陳雲：〈對抽紗出口問題的幾點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422。德信行是由外貿部領導的香港華潤公司所管理的一家貿易公司，也是中國土畜產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

^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頁210。

這一通道，引進國外先進的生產、科學技術，“洋為中用”，為廣東工農業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①通過考察，把握港澳經濟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學習港澳加工貿易的經驗，有利於引進港澳地區的資金和技術，承接產業轉移，推動工業化建設，擴大對外出口。

二、投石問路：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派出

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對港澳展開了為期27天的考察。考察組由國家計委、外貿部和北京、上海等多個單位共同參與。考察組在港澳期間，主要由華潤公司和南光公司負責接待，包括安排參觀和座談。^②在各方配合協助下，考察組深入港澳各行各業瞭解情況，聽取駐港澳機構匯報，最終形成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圓滿完成考察任務。

（一）精心選派專業人員參加考察

選派合適的人選是組建考察組的首要工作。華國鋒、谷牧等中央領導從國務院和地方省市，選派了26位堅定可靠、業務專精的幹部組成考察組，並由段雲擔任組長、房維中任副組長。^③

這批人員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從成員組成結構上看，他們既有來自中央也有來自地方。如有長期負責地方外貿工作的北京對外經貿委員會副主任肖秧和上海外貿局書記賈振之，一直在國家經貿領域一線耕耘的國家計委財貿局局長文業經、外貿局處長叢夢卿和由外貿部委派出的計劃局、儲運局局長凌詒澤、岳巍等。^④這樣的人員結構體照顧了中央和地方外貿工作的差異性。二是從成員個體素質看，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豐富的外貿工作經驗是選派的重要標準，如考察組組長段雲，曾在日本明治大學經濟系學習，是“科班”出身，新中國成立後長期在財貿部門工作，後出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財政和貿易工作，是國內外貿領域的專家。這類成員，不僅可以從專業視角把握考察工作，而且能夠看到差距後，堅定發展信心。

（二）合理規劃考察方案

受考察時間和人員數量限制，既要從整體把握港澳的發展情況，又要對各行各業有一個深入而細緻的瞭解，考察組需盡可能合理地規劃考察方案，做到點面結合、詳略得當。

首先，深入基層，瞭解市場情況。考察組到內地廠商在香港辦的兩個工廠——天廚

^①〈關於向我駐港華潤公司收集國外科技資料、產品樣本的請示報告〉，1975年10月1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6-A0.05-21-78，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②吳學先：《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19。

^③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紅色華潤》編委會編：《紅色華潤》，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19。

^④王志強：〈從段雲率組考察港澳到經濟特區的建立〉，《黨史博覽》（鄭州），第7期，2021年，頁47。

味精廠和南洋兄弟煙草廠參觀考察。考察組發現，這兩個廠設備和工藝落後，許多流程要靠工人手工操作。^①考察組還到商店和市場調研，瞭解供應情況。他們發現內地的商品，不論樣式和品質，都比不上香港當地產品，和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比更加遜色。鮮活市場上大部分產品數量不足，品質不好，賣不上好價錢。例如美國的柳丁一個賣一港元，內地的柳丁幾個才賣一港元。^②如此細緻的考察，為撰寫考察報告提供了真實、可靠的數據支撐。其次，廣泛調研，考察諸多行業。考察組不局限在工商業，對金融、旅遊、航運等領域也進行了瞭解。考察組注意到：內地在港澳的銀行，主要開展吸收儲蓄存款的業務，而放貸很少，活動面不廣，存款額增長不快，沒有發揮金融業在籌措資金方面的作用。此外，港澳作為旅遊中心，遊客數量連年增長，但是內地在港澳只有一個中國旅行社，沒有其他的旅遊配套設施。連經港澳入境的遊客，都要介紹到當地旅館住宿。^③這樣的考察全面且深入，為今後調整工作方案、制定改革策略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

（三）開展座談，廣泛聽取各界意見

考察工作不僅要“眼觀六路”，還要“耳聽八方”。考察期間，段雲同內地駐港澳機構華潤公司、南光公司、招商局、中國旅行社等機構負責人及部分愛國廠商進行座談，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會談中提出的意見得到了考察組的高度重視，段雲不僅對意見進行回應，而且將它們整理後一併寫入考察報告中。

如招商局袁庚^④向考察組建議：“招商局打算利用當地銀行外匯貸款，抓住船價大跌的有利時機，增添一批新船和半新船，建成一支有競爭能力的船隊，開闢班輪航線，開展對外攬載業務。”^⑤該建議被考察組接納並寫入報告，為內地發展在港航運力量，擴大貨物出口，開展集裝箱運輸提供指導。又如華潤、南光等公司負責人反映行政審批手續繁瑣，容易錯失商機。段雲對機構負責人回答道：“你們可以隨時派人到海外，進行業務活動，由港澳工委批准，不必報請內地審批。”^⑥在報告中考察組就建議“給華潤公司和南光公司一定的獨立處理業務的權限”。^⑦這一建議反映了廣大駐港機構的心聲，為今後鞏固和壯大內地在港經濟力量打開了突破口。

除了聽取駐港機構的匯報外，考察組在返程途經廣州時，向習仲勳、劉田夫等廣東省領導建議，把寶安、珠海兩縣改成省直轄市並得到贊同。^⑧習仲勳等人向考察組提出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建議。^⑨這種雙向回饋，打開了地方領導的視野，也讓報告能

^①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61。

^②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1-52。

^③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62。

^④時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受部長葉飛委派前往香港調查招商局經營狀況。

^⑤張雄文：《潮卷南海——深圳風雨一百年》，深圳：海天出版社，2021年，頁165。

^⑥張雄文：《潮卷南海——深圳風雨一百年》，深圳：海天出版社，2021年，頁139。

^⑦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7。

^⑧李海文：〈篴路藍縷，以啟山林——改革開放的廣東起點〉，《同舟共進》（廣州），第12期，2018年，頁41；《廣東改革開放史》課題組編著：《廣東改革開放史（1978-2018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36。

^⑨《習仲勳傳》編委會：《習仲勳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444。

夠充分地考慮到地方的訴求，上下達成共識，推動政策實施。

（四）認真總結經驗，落實考察報告建議

考察的關鍵體現在考察報告的品質，而考察的成敗則在於落實。《港澳經濟考察報告》重點突出，觀點鮮明，清晰地呈現了港澳的基本情況，提出了許多高瞻遠矚的建議。

一方面，考察組的報告堅持實事求是，內容豐富而深刻。首先，它較為全面地展現了港澳的基本情況，深入分析港澳實現經濟騰飛的原因是：“有充裕的資金來源”、“擁有廉價勞動力”、“港澳都是自由港”和“大力發展加工工業”。^①其次，該報告不掩蓋內地和港澳之間發展的差距，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意識到“許多應該辦而又能辦的事情，我們沒有辦；不少很容易發展的事業，我們裹足不前”。^②最後，考察組提出全面且精準的意見，一是建設好寶安、珠海兩個基地；二是充分發揮內地駐港澳貿易機構的作用；三是利用港澳發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四是建議加強在港澳的經濟力量。^③

另一方面，這份報告得到中央領導肯定，所提建議大都得到落實。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聽取段雲所作的工作報告後認為：“這次組織人出去，考察是認真的，考察以後起了很好的作用”，並提出“看準了的東西，要抓落實”。^④1978年7月，國務院頒佈《開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試行辦法》，決定在上海、福建等地實施加工貿易政策。1979年7月，中央和國務院允許廣東先行一步，實行特殊的經濟管理體制。這表明該報告的建議得到有效落實，為改革開放產生了積極作用。

三、春鴨試水：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的積極影響

（一）增強了中央緊迫感，促進思想解放

此次考察使中央大開眼界，意識到同港澳的發展差距，產生了緊迫感。華國鋒表示：我們“出去看看”，知道了落後和差距，但光有感觸和意見不夠，還要“研究怎樣吸取國外的經驗教訓，加快我們的速度”。^⑤1978年7月，在聽取各考察組的匯報後，中央決定召開國務院務虛會議。華國鋒在會議上強調：“只要我們領導得好、組織得好，及時總結經驗，是可以加快發展速度的。”^⑥1979年5月，谷牧在珠海視察時表示：“我們不能再‘睡覺’了，要‘醒’過來，來一個大轉變。”^⑦這種因差距帶來的焦慮，並沒有讓中央心灰意冷，

^①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0。

^②王志強：〈從段雲率組考察港澳到經濟特區的建立〉，《黨史博覽》（鄭州），第7期，2021年，頁50。

^③段雲：〈港澳經濟所見〉，《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51–60。

^④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一分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頁118–19。

^⑤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一分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頁127–28。

^⑥房維中：《在風浪中前進：中國發展與改革編年紀事（1977–1989）》（第一分冊），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23年，頁139。

^⑦李先念：〈現在是覺醒的時候了〉，深圳市檔案館編：《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4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頁2800。

而是催生了更多變革的內生動力，激發了改革的鬥志。

強烈的緊迫感推動着思想的解放，從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學習新知識、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熱潮。例如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為適應外貿、僑務、科技文化交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等方面的日益發展，用外匯訂購《大公報》、《文匯報》、《華僑日報》、《經濟導報（週刊）》、《星島日報》等境外報刊，以便更多地瞭解一些國外動態情況。^①這股“學習潮”，為突破經濟發展的思想禁錮，實現體制機制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學習到發展經驗，推動對外開放

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從港澳學到諸多經驗，這些經驗經過吸收、完善後開始在國內推廣。例如：考察組建議學習香港進料加工和來料加工的經驗。1979年3月和9月，國務院頒佈《以進養出試行辦法》和《開展對外加工裝配和中小型補償貿易辦法》，來料加工裝配和補償貿易政策在全國加速推廣。1979年12月，國家計委、中國人民銀行給予廣東省貸款，用以幫助對外加工裝配設備和廠房的增建、改建。^②通過學習港澳經驗，上海、廣東等地加工裝配業迅速發展，推動了當地產業轉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為引進先進技術提供了資金支持。

作為這次事件的親歷者，考察組成員受到的衝擊更為強烈，思想認知更為深刻。1978年12月，段雲在全國僑務會議和第二次歸僑代表大會上指出：如果我們把自己封鎖起來，拒絕交流，不吸收別人已經取得的成果，就會“削弱自力更生的力量”。^③這體現了考察對思想帶來的“洗禮”作用，讓他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對外交流的重要性。

更為關鍵的是，考察結束後，許多人回到經貿工作一線積極參與到政策的落實中。1978年6月，段雲再次來到寶安，落實中央領導關於建設珠海、寶安外貿基地的批示。當地領導方苞反映建設資金困難，段雲當即批示每年拿出400萬元人民幣支持基地建設。^④考察組成員將考察所學所得付諸於具體實踐中，積極投身到對外開放事業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帶動更多幹部的解放思想。

（三）重新佔領了港澳市場，加強了與粵港澳經濟聯繫

為重新奪回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考察組建議將寶安和珠海建成出口基地。1978年6月，李先念在全國物價會議上作出“把廣東的寶安和珠海搞成外貿基地，千方百計佔領港澳市場”的重要指示，推動了這一建議的“落地生根”。^⑤

^①〈同意撥給省革委會辦公廳秘書處外匯訂購香港出版的報刊〉，1979年3月19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53-2-369-85~88，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②〈下達對外加工裝配、中小型補償貿易專項貸款指標的通知〉，1979年12月2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53-2-361-1~1，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③段雲：〈當前國民經濟形勢和擴大國際經濟交流問題〉，《段雲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15。

^④陶一桃主編：《深圳經濟特區年譜：1978.3~2015.3》（上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5年，頁1；方苞：〈深圳經濟特區初創時期的實踐和認識〉，深圳市檔案館編：《建國卅年深圳檔案文獻演繹》（第4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頁3102。

^⑤《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295。

廣東省在珠海和寶安擴建農場和畜牧場，積極發展生產，擴大出口，增加生豬、雞、鴨、魚等副食品的供應，同時改良品種，發掘新貨源。“三來一補”政策實施後，還利用貿易補償的方式擴大進出口，賺取外匯。例如，珠海香洲公社與香港新興隆魚欄就用貿易補償方式，“購進四百至五百匹馬力雙拖作業漁船十艘”，為國家引進了先進技術設備。^①到了1982年，內地重新佔據香港進口市場首位，奪回了在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②這些努力不僅擴大了出口，為港澳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生活物資，維護了港澳市場的穩定，而且發揮了加速邊境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

此外，為增加港澳供應而興建的寶安、珠海出口基地，1980年設立為經濟特區，成為粵港澳合作的“熱土”。以深圳為例，1984年底全市和外商簽訂的各種協議達3,493項，僅三來一補項目就有2,695項，佔總數的77.15%，這些項目許多來自港澳地區。^③此外，雙方開展多種經營和多種形式合作，由“我方負責提供配件，港商負責在香港裝配和銷售”。^④通過這些經濟合作，逐漸形成“前店後廠”的發展格局，強化了粵港澳的經濟聯繫。

（四）掀起了赴港澳考察熱，促進港澳與內地的交往交流

港澳經濟貿易考察組之後，全國掀起聲勢浩大的赴港澳考察潮。廣東省委領導習仲勳安排各地委書記前往香港、澳門參觀訪問，由省委秘書長楊應彬和副省長黃靜波帶隊，^⑤並批准中山小欖鎮大隊支部書記帶隊出國考察的申請，開創了農民出國考察先例。^⑥廣東省還組織下屬廣播局幹部前往香港考察卡式文藝磁帶生產，^⑦派省工交辦幹部前往香港參觀世界照相機博物館，並購買照相機、膠卷等樣品。^⑧據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統計，僅從1978年1月至11月底，專程去香港考察的團隊有112批，共824人。^⑨這些考察組涵蓋範圍廣，成為改革開放前夕的“偵察兵”，推動各級部門解放思想，擴大對外交流，讓越來越多的內地幹部瞭解到外部世界發展的最新動態。

緊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也利用地方資源，積極落實《港澳經濟考察報告》中在寶安和珠海開闢遊覽區的建議，為港澳居民到內地度假遊覽提供配套服務。1984年7月，國務院批准將深圳梅沙開闢為港澳地區專用的旅遊口岸。大批港澳同胞到粵探親訪友、觀光旅遊。1988年6月起，深圳每年舉辦荔枝節，邀請港澳同胞來深品嘗荔枝、敘鄉親，廣交朋友，

^①〈與香港新興隆魚欄進行漁業補償貿易的覆文〉，1979年1月2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53-2-365-117~126，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②《香港經濟貿易統計匯編（1947-1983）》，香港：華潤貿易諮詢有限公司，1984年，頁53。

^③深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深圳市志》（改革開放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頁165。

^④〈關於同意與港商合資成立香港電器配件有限公司的批覆〉，1981年8月1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77-2-75-29-31，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⑤陳應彬：〈在仲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幾件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習仲勳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頁275。

^⑥〈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人〉，《深圳特區報》（深圳），2013年10月12日，版1。

^⑦〈借撥給省廣播局赴港考察費用外匯二千美元〉，1978年10月2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53-2-331-152~154，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⑧〈撥給省工交辦赴港參觀組購買樣機一千美元〉，1978年11月22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53-2-331-187~194，2024年3月19日讀取。

^⑨吳元浩：《往事鈞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8。

加深友誼。^①通過吸引港澳同胞到內地旅遊，能將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傳播到港澳社會，激發港澳同胞的認同感，進一步促進粵港澳人民的交往交流。

四、結語

組建港澳貿易考察組赴港澳考察，是改革開放前夕“對資本主義陣地作的具有探索性的最早偵察”，^②為改革開放找到了很好的參照點，起到了春鴨試水的積極作用。這一過程包含兩層邏輯：一是考察發端於探究港澳經濟飛速發展的原因，落實在引進港澳資金、技術，逐步拓展到完善經濟體制、實行改革開放。港澳與內地一衣帶水，兩地發展間的巨大差距刺激着領導幹部的神經，得益於全國上下實事求是、敢於承認差距的勇氣和胸襟，引進港澳資金技術、學習發展經驗成為普遍共識。這也導致在更廣更深的範圍內學習借鑑港澳發展經驗，從開始學習加工貿易，到對地產、法律、金融、工商等制度的學習，這些來自港澳的先進經驗在中國改革開放和走向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二是考察報告相關建議的落實，推動內地重新奪回港澳市場的優勢地位，爭取到港澳社會的民心民意，這種情感價值幫助內地獲得大量來自港澳的資金支持。改革開放後，許多港澳同胞紛紛回鄉投資，支援國家建設，如引進外資中就有 60% 來自港澳。這些無疑體現了港澳同胞關心、熱愛祖國的愛國情懷，增進了同內地人民的情誼，促進了粵港澳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力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①深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深圳市志》（改革開放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 年，頁 441。
^②雷厲：《歷史風雲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98。